

《宋书》诗学文献考论

钟仕伦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摘要:《宋书》中保存了不少关于诗歌创作、诗人轶事、《诗经》引用和歌谣谚语、乐府歌辞等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是我们研究汉魏六朝诗学发展的重要文献。通过对《宋书》诗学文献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诗经》之学的演变和七言诗形成的过程,从而加深我们对南朝诗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诗学经先秦“诗学之学”至两汉“《诗经》之学”到魏晋“诗歌之学”的嬗变,特别是《宋书》对《诗经》的引用,可以引发我们对魏晋文学自觉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宋书》;诗学文献;《诗经》引用;诗歌作品;歌谣谚语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1-0119-08

《宋书》为现存记载南朝刘宋一代历史比较完整的史书,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魏晋之后,文学与史学立馆分授,逐渐区分,但“六朝修史,最喜载文”^{[1]279}。参与《宋书》编撰的徐爰“颇涉书传,犹悉朝仪”^{[2]2310};续成其书的沈约“才智纵横”,“诗多而能”,为诗“长于清怨”^①,虽清淡却有旨意,二人的文学修养,特别是沈约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声律的研究,对《宋书》载录诗学文献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正因如此,《宋书》中保存了不少诗学文献,是我们研究南朝诗学发展的重要史书。同时,通过对《宋书》诗学文献的考论,可以了解中国诗学经先秦“诗学之学”至两汉“《诗经》之学”到魏晋“诗歌之学”的嬗变,特别是《宋书》对《诗经》的引用,可以引发我们对魏晋文学自觉的重新思考。

—

提到《宋书》的诗学文献,不能不提到《谢灵运

传》和《谢灵运传论》。《谢灵运传论》已有众多专门的研究,暂不涉及,这里只探讨《谢灵运传》。

《宋书》的编撰开始于宋文帝元嘉(424—453)中,书中多称“今上”,如卷七十二《南平宣简王刘宏传》附子《刘景素传》“至今上即位,乃下诏曰”^{[2]1868},卷七十四《沈攸之传》记攸之败死,其党“臧焕诣盆城自归,今皇帝命斩之”^{[2]1943}。梁玉绳说,“今上”、“今皇帝”者,即齐武帝。此可证明,《宋书》虽然经过徐爰等人的不断编撰,但最后成书由沈约完成,时间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二月,沈约“入梁未及修改”^{[3]476}。而齐梁时期,谢灵运诗歌风格的影响非常大。南齐武陵昭王萧晔“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4]624-625} 萧梁时期的伏挺“幼敏寤,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有才思,好属文,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5]719}。王籍“好学,有才气,为诗慕谢灵运。至其合也,殆无愧色。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严

收稿日期:2016-06-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诗学文献集成校笺”(14ZDB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钟仕伦(1953—),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美学研究。

(庄)周”^{[6]580-581}。同时,齐武帝萧赜又喜好诗咏,常集群臣赋诗,“(永明)八月丙午,车驾幸旧宫小会,设金石乐,在位者赋诗”^{[4]49}。由此可见,谢灵运在齐梁诗坛的地位很高,影响很广泛,不少诗人向谢灵运学习,效仿他的诗歌风格。《宋书》多载谢灵运诗作,实际上也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反映和对“康乐体”的宣扬,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诗学文献。

《谢灵运传》载录了谢灵运诗作的本事和创作的环境。例如:“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又谢灵运寻山造幽,惊动临海太守王琇,又邀王琇同游更进,王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作临川内史时,谢灵运“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以及临刑前所作的“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自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愆。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2]1745-1777}等等,无疑是我们研究谢灵运诗歌最直接的史料。

《谢灵运传》说,谢诗“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2]1777}。也就是说,谢灵运至死都没有改变他的世家大族的政治立场。《谢灵运传》所记载的这些关于谢灵运诗歌创作的本事和环境,不仅使我们更加真实的了解了谢灵运的诗歌艺术,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晋宋之际所发生的文化与血缘、军功与世家的矛盾的转化。卷五十八《谢弘微传》载录的有关谢混的诗事,也反映了这种易代之际的历史嬗变:

(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因酣宴之余,为韵语以奖励灵运、瞻等曰:“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沉儒,若能去方执,穆穆三才顺。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质胜戒无文,其

尚又能峻。通远怀清悟,采采摽兰讯,直辔鲜不蹶,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无勑由慕蔺,勿轻一篋少,进往将千仞。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灵运等并有诚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也。远即瞻字。灵运小名客儿。^{[2]1591}

谢氏在谢鲲、谢衰时,尚未成为江左高门,至谢安、谢万时才因军功阀阅成为世家大族。谢混为谢灵运叔父,谢安之孙;谢灵运曾祖父谢奕与谢安为兄弟,同为太常卿、吏部尚书谢衰之后。但谢氏显赫的社会地位在晋宋之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被同样起于军功的彭城刘氏所迅速取代。谢混的这首诗实际上透露出谢混对家族衰败乃至祸亡的担忧和恐惧。曹道衡和沈玉成认为,谢混这样做的目的,“实为树立家族声誉,且寓抗衡王氏之意,事关两族势力消长”^{[7]315}。但此时的王氏,无论是太原王氏还是琅琊王氏,也与谢氏一样,正走向衰落,谢混要提防的恐怕已不是王氏而是以刘裕为代表的彭城刘氏。

据钱大昕和梁玉绳说,沈约最后编定《宋书》时,删去了原有的《谢混传》,这里虽然有沈约编撰史书体例的考虑,但更多的可能是谢混因党于刘毅被诛的影响^②。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里看出谢混的“风流之姿”和维护谢氏家族社会地位的苦心。谢混于灵运“诞通度”的诚厉之言终至灵验,不幸而言中,谢灵运最终被起于军功的刘宋王朝所死。

《谢灵运传》中还保存了一件“诗案”:

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何)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于宗人何勔,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增城令。^{[2]1775}

何长瑜与谢灵运、谢惠连、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情投意合,常以诗酒赏会,并为山泽之游,当世谓之“四友”。谢灵运曾以“当今仲宣”称誉何长瑜。何长瑜是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的主力,但却因为作诗讥讽刘义庆好友陆展,被刘义庆奏贬岭外增城令,后来因庐陵王刘绍召为书记之任,赴任途中遇暴风雨溺死。此为 中国诗坛上比较早的“诗案”,似可以谓之“染发诗案”。

除了《谢灵运传》外,如卷七十六《王玄谟传》所

载：“孝武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而玄谟独受‘老伦’之目。凡所称谓，四方书疏亦如之。尝为玄谟作四时诗曰：‘董茶供春膳，粟浆充夏飧。麴酱调秋菜，白醪解冬寒。’”^{[2]1975}卷七十七《沈庆之传》：“上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庆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称其辞意之美。”^{[2]2003}卷六十九《范晔传》：“晔在狱为诗曰：‘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比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懵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2]1827}如此等等，对我们了解刘宋王朝由军功起家而至文化新贵的历史转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这是《宋书》诗学文献的第一个特点。

二

《宋书》诗学文献的第二个特点，是对《诗经》的引用。在《宋书》的“史臣曰”中，经常引用《诗经》的句子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例如卷四十九“史臣曰”引《诗·大雅·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对孙处、蒯恩、刘钟、虞丘进等战将给予高度的评价：“此诸将并起于竖夫，出于皂隶刍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奋其鳞翼。至于推锋转战，百死而不顾一生，盖由其心一也。遂飨封侯之报，诗人之言信矣。”^{[2]1441-1442}史官的这种赞誉让我们看到了起于武夫、终于侯爵的社会现象，对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身份性转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卷五十三“史臣曰”引同篇“温温恭人，惟德之基”^③，对江夷、谢方明、谢弘微、王惠、王球等人作了“学义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贞心雅体，廷臣所罕及”^{[2]1526}的历史评价，可谓恰到好处。卷八十八引《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④对薛安都的人品进行了针砭：“安都勤王之略，义阙于蕃屏，以地外奔，罪同于三叛。其此之谓乎？”^{[2]2225}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引《诗·郑风·扬之水》“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和《诗·小雅·常棣》^{[2]1794}，劝诫宋文帝勿轻信谗言以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卷四十四《谢晦传》引《诗·小雅·青

蝇》“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恺悌君子，无信谗言”^{[2]1357}，以证谢晦的深谋远虑；卷三十二《五行志三》针对“有鹑入太极殿，雉集东堂”^[2]，引《诗·邶风·鹑之奔奔》“鹑之疆疆，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2]934}贬责篡位的赵王伦。

除了引用《诗经》评价历史人物外，《宋书》还征引《诗经》来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和佐证礼仪制度。如卷七十二《文九王传》引《诗·大雅·瞻卬》“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来表达史官对明帝后期“疑隙内成，寻斧所加，先自至戚”^{[2]1886}而引起社会动乱的痛惜和警醒；卷九十四《徐爱传》徐爱上表引《诗·商颂·长发》^{[2]2309}，以表明自己撰写国史、以成一家之言的心志；卷三《武帝纪下》载永初三年（422）正月乙丑诏令，引“《国风》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怀古”^{[2]58}以弘振儒学，敦崇学艺，以明宋国建立学官的重要性；卷五十七《蔡廓传》引《诗·召南·何彼襛矣》序“（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礼秩，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2]1570}，以证建立宋朝诸王、王子、王后等舆服礼仪、朝堂顺序的合法性；卷五十二《袁湛传》引《渭阳》之诗用于家族训诫^{[2]1498}，等等，无一不证明《诗经》在刘宋王朝建立礼乐制度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宋书》的《乐志》是中国礼乐史和诗歌史上的经典文献。《后汉书》、《三国志》均无《音乐志》，自东汉至宋代的雅乐登哥^⑤、郊庙哥辞以及朝堂音乐的演奏仪式，特别是大量的合乐歌词，现在还保存在《宋书》的《乐志》中，这对我们研究东汉以来的礼乐制度及其歌诗演唱内容有很大的帮助。《宋书·乐志》不仅引《诗经》以明制定礼乐的重要性，如卷十九《乐志一》载建平王刘宏奏议宋郊庙音乐，又晋散骑侍郎顾臻表引《诗·周颂·雍》“燕及皇天，克昌厥后”^{[2]546}，以证纂备雅乐的必要性，《小雅·楚茨》“神保遘归”及注“归于天地也”^{[2]543}，以证祭祀礼乐迎神送神当制哥辞，而且还保存了大量的乐府诗歌。这些哥辞不仅具有诗学价值，而且具有史学价值。此外，《宋书》记载了宋之前各个朝代关于朝廷音乐、郊祀音乐的制度和演奏以及歌词的具体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书》的《乐志》也就是一部礼仪音乐史。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乐志一》还记载了有可能是我国古代比较早的西域杂技音乐：“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拊舞》、《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焉。”^{[2]546}从名称上看，这些百戏节目可能是从西域、海上或南方丝绸

之路随佛教传入中土,原先也应有歌词,只可惜未保存下来。

较之《春秋》的“微言大义”,《宋书》的史赞以《诗经》来褒贬历史人物更加直接明白。《左传》、《史记》、《汉书》等引《诗经》大都用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身的叙述和描写,很少用于史评,可谓“以《诗》证史”。而《宋书》在“史臣曰”和典制制度的论证中引用《诗经》的诗句,为的是借古喻今,以史为师,此可谓“以《诗》鉴史”。

从《宋书》引用《诗经》以古鉴今和《乐志》对礼乐制度的论证可以看出,宋文帝虽然建立了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表面上是将文学与史学、玄学、儒学加以分隔,但实际上儒家学说与所谓的“文学”难以做到实质上的区分。历经汉末大乱和五马南渡的两次社会大动荡,《诗经》之学已经遭到极大的破坏,已无昔日崇高的社会地位,但它依然是刘宋王朝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应该说,《宋书》的编撰者对此深有体悟。刘宋王朝起于军功,皇权在握,从武帝到明帝,深知马上得来不可马上治之之理,十分重视兴教建学以形成重文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宋文帝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艺为业”^{[2]1971},上至天子,下至士人,对《诗经》多有涉猎。宋孝武帝虽然朝仪失礼,拿群臣的相貌、身份、籍贯开玩笑,但他还是在玩笑中显露了他对《诗经》——如前引孝武帝取笑身为北方人的王玄谟为“老伧”所作的《四时诗》“堇荼供春膳”就出自《诗·小雅·绵》的诗句——的了解。而元嘉二十一年(444)大旱民饥之时,徐耕“诣县陈辞”,用“《鹿鸣》之求,思同野草,气类之感,能不伤心”来为民请命^{[2]3251},表达自己对灾民的同情,则褪去了汉儒笼罩在《诗经》上的光环,将“诗三百”的本来面目还原到现实生活之中,就诗歌观念的发展来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三

《宋书》诗学文献的第三个特点是通过诗歌作品和民间歌谣谚语来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

先说诗歌作品。

除了比较著名的、由谢晦代笔所作的武帝的北伐诗“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6]522}外,文帝也写有两首北伐诗。一首是元

嘉七年(430)所作的《滑台诗》:

逆虏乱疆场,边将婴寇仇。坚城效贞节,攻战无暂休。覆渚不可拾,离机难复收。势谢归途单,干焉见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忠臣表年暮,贞柯见严秋。楚庄投袂起,终然报强雠。去病辞高馆,卒获舒国忧。戎事谅未殄,民患焉得瘳。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愿想凌扶摇,弭旆覆中州。爪牙申威灵,帷幄聘良筹。华裔混殊风,率土决王猷。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2]2334}

宋文帝的这首诗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很有代表性。此时的拓跋焘统一了北方,“西定陇右,东灭黄龙,海东诸国,遂并朝贡”^{[2]2331}。而文帝却因武帝的连年北伐,国力远非曩时可比,因此失掉洛阳、滑台、虎牢等战略重镇。文帝此作虽然没有武帝北伐诗的雄奇奔放,却也真切动情,抒发了文帝与民患难、与国同忧的心境和统一南北、混成天下的抱负。在南朝帝王的诗作中,有这样的诗歌和襟抱实属难得。同时,这首诗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起于军功的刘氏王朝向文化世家转变的历史事实^⑥。元嘉二十三年(446),拓跋焘“破略太原”,“寻又寇兖、青、冀三州,遂及清东,杀略甚众”^{[2]2341},文帝又作了一首诗:

季父鉴祸先,辛生识机始。崇替非无徵,兴废要有以。自昔沦中畿,儻焉盈百祀。不睹南云阴,但见胡风起。乱极治必形,途泰由积否。方欲涤遗氛,矧乃秽边鄙。眷言悼斯民,纳隍良在己。逝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时乎岂再来?河清难久俟。骀安局步,骐骥志千里。梁傅畜义心,伊相抱深耻。赏契将谁寄,要之二三子。无令齐晋朝,取愧邹鲁士。^{[2]2342}

这首诗已经看不见文帝第一首中的“志气若云浮”、“弭旆覆中州”的凌云壮志了,虽然也有“逝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的愿望,但更多的是哀叹“时乎岂再来,河清难久俟”,文帝这时似乎已经产生了“委事任人,自取逸乐”、“徒存日晷,终有惭德”的退隐之心。这两首诗都不载于《文帝纪》而录在《索虏传》,其原因不得而知,但它让我们距离更近地接近了文帝,不仅对辛弃疾的“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有了更感性直观的历史体悟,而且对文帝提倡文学,“士人并以文艺为业”的历史成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现在说歌谣。《宋书·乐志一》有一段专门论述民间歌谣的话：

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哥。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伐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匿粮，乃鬻哥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哥，一里老幼，喜跃拊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遣之。故雍门之人善哥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哥，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哥也。《尔雅》曰：“徒哥曰谣。”^{[2]548-549}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宋书》非常重视民间歌谣，秦青之伎、薛谈之讴、韩娥雍门之鬻歌、王豹淇川之善化、绵驹高唐之咏哥，以及前汉之虞公，虽并为“徒哥”，但它们却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同时，“徒哥”又是乐府诗歌的起源之一：

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吴哥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凡此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2]549-550}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乐府，应该说是经过了从徒哥到配乐，又从配乐到“造哥”这样三个阶段。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篇中将它概括为“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8]101}，其实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宋书》保存的民间歌谣谚语对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描写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卷二《武帝纪中》“(丁)昨骁勇有气力，时人为之语曰：勿跋扈，付丁昨”^{[2]29}，既反映出建康民众对诸葛长民“贪淫骄横”的愤怒，又揭示出易代之际“狡兔死，走狗烹”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其他如“三公锄，司马如”^⑦，“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

居”^⑧，“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⑨和“变故易常，不乱则亡”^⑩等，将三国归晋、“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的历史事件用极精炼的语言概括出来，震撼力十分强烈。值得注意的是，较之前世史书所载歌谣谚语，《宋书》所载七言歌谣明显增多。如卷二十七《符瑞志上》引孔子《河洛谶》曰：

二口建戈不能方，两金相刻发神锋，空穴无主奇入中，女子独立又为双。^{[2]784}

卷二十七《符瑞志上》载《金雌诗》曰：

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时。^{[2]785}

卷三十一《五行志二》载：

芦苇单衣篋钩络，于何相求成子阁。^{[2]913}

荆笔杨版行诏书，官中大马几作驴。^{[2]914}

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骷髅生齿牙。^{[2]915}

屠苏障日覆两耳，当见瞎儿作天子。^{[2]915}

虎从北来鼻头汗，龙从南来登城看，水从西来何灌灌。^{[2]915}

黄头小人欲做乱，赖得金刀作蕃扞。^{[2]918}

官家养芦化成荻，芦生不止自成积。^{[2]919}

卷七十四《臧质传》载：

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虜马饮江水。虜主北归石济死。虜欲渡江天不徙。^{[2]913}

这些七言歌谣，涉及到晋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七言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七言诗发展过程的另外一个视域。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在叙说“七言”诗时，以汉武“柏梁体”为七言之椎轮，他用《文选》所载张衡《四愁诗》和曹子建七言乐府为证，接以唐诗作者^{[9]32}；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同样以“汉魏诸作，既多乐府，唐代名家，又多歌行”^{[10]105}来论说七言诗的发展，但二人均未言及《宋书》所载七言谣谚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宋书》所载七言谣谚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刘宋王朝是七言诗发展很快的一个阶段，元嘉时期，鲍照、汤惠休的乐府诗歌中已多有七言体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书》所载七言歌谣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诗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

除了上面谈到的几个方面外，卷七十三《颜延之

传》还记载了史臣对颜延之诗作的评价。颜延之因得罪刘湛、殷洪仁等当朝权贵,屡仕被黜,“每犯权要”,后被刘湛“言语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2]1893}。本传在其咏阮咸“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稻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四句诗后曰:“此四句,盖自序也。”“自序”是最能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文章。《金楼子·自序》曰:“人间之世,飘忽几何?如凿石见火,窥隙观电;萤睹朝而灭,露见日而消。岂可不自序也。”^{[11]1343-1344}颜延之的宦海沉浮与竹林七贤的阮咸、刘伶十分类似,此诗写的实际上是颜延之自己的身世。因此,《颜延之传》的这个评价,既可看作是“史评”——对颜延之的怀才不遇和直率性格的评价,又可看作是“诗评”——对颜延之《五君咏》言在此而义在彼的诗歌风格的赞赏。

卷九十三《陶渊明传》在引载《五柳先生传》之后,也有“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2]2887}的评语。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传》除了载录一首《命子诗》^⑥以述家风以外,很少载录陶渊明的其它诗作。陶渊明的曾祖为东晋荆州刺史、大司马陶侃,曾东下平定苏峻之乱,于江右社稷功不可没,陶渊明颇以此为豪,并以此劝诫子孙。但陶渊明又曾入桓玄幕中。刘裕讨桓玄,东晋禅于宋,陶渊明“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世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2]2288-2289}。陶渊明之诗中有“刑夭舞千戚,猛志固常在”一类的话,鲁迅就说他有济世之志。经过晋宋易代之际的世事巨变,陶渊明产生了“稻此洪族,蔑彼名级”^{[12]颜延之《陶徵士诔》,791}和“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⑦,即不与刘裕合作而彻底归隐的想法。这可能是史官阙载陶渊明诗作的原因。

但不管怎么说,《宋书》多载诗学文献,除了宋文帝好文的原因外,与《宋书》的编撰者密切相关。据《宋书·徐爰传》和《宋书·自序》,《宋书》的编撰者有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和沈约,但“休文修史,已在易代之后”^{[13]48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三考证,沈约“仅续成永光至禅让十余年间事,删去《桓玄》、《谯纵》、《卢循》、《马鲁》、《吴隐》、《谢混》、《郗僧施》、《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十三传而已”^{[3]475}。

钱大昕认为,徐爰《宋书》以桓玄等人入列传,依

据的是陈寿《三国志》和范曄《后汉书》的体例,“而沈约非之”^{[13]484}。徐爰在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三朝皆为著作郎,“颇涉书传,尤悉朝仪。元嘉初便人侍左右,预参顾问,既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太祖所遇任”^{[2]2310}。徐爰的经学和文学修养都很高,他曾经对潘岳的《射雉赋》做过注。从他以《楚辞》的“青春受谢”并王逸章句注《射雉赋》的“于是青阳告谢”,以《诗·小雅·白华》的“英英白云”并《毛传》注“天泱泱以垂云”,以《诗·邶风·瓠有苦叶》的“有鸛雉鸣”纠颜延之判潘岳“雉鸛鸛而朝鹄”^⑧之误,引《诗·小雅·桑扈》的“有鸛其羽,翼如绮文”注“鸛绮翼而經拊”^⑨等来看,徐爰娴熟于《诗经》、《楚辞》。沈约则为齐梁文坛巨擘,诗歌创作数量极多,而且以“永明体”和“四声八病”说领袖诗坛,扬名后世。所以,无论是“专为一书”的徐爰^⑩,还是“续成其书”的沈约,为历史史实和个人喜好计,都自然会在《宋书》的编撰中载录诗歌作品和引《诗》证史,从而保留下不少的诗学文献,使我们得以发现魏晋南北朝诗学发展的过程。

五

通过《宋书》所载诗学文献,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看法。

一是可以看出中国诗学经先秦“诗学之学”至两汉“《诗经》之学”到魏晋“诗歌之学”的嬗变过程。《宋书·谢灵运传论》在檀鸾《续晋阳秋》^⑪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总结了这一嬗变的过程,并创造性地阐发了“声律说”的基本理论,开启了近体诗的发展轨迹。

其次,虽经汉末大乱,儒家经典被“请用从火”^⑫,但《诗经》之学的传承、《诗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功用直到刘宋王朝都未曾丧失^⑬,从《宋书》引证《诗经》以正朝纲礼乐制度和“史臣曰”的史赞中可以得到证实。从这个视域说,虽有曹丕“诗赋欲丽”和陆机“缘情”说的标榜,所谓“文学自觉”、“文学独立”,特别是用这一时期的“文笔说”分“纯文学”与“杂文学”的作法,恐怕还得仔细校练。

第三,由于汉字体兼音、意,形同图画,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就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虽然从审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西方也是史、诗不分,《荷马史诗》就

是一部历史书,维柯甚至从《荷马史诗》中考证出“阿特拉斯”的地理位置^⑩。但是,自柏拉图试图区分诗歌和哲学,甚至和政治的关系,与亚里士多德将“诗学”和“史学”的性质分别确立以后,西方的诗学和史学就逐渐分道扬镳,一个朝向未来,一个回眸过去^⑪。中国诗学则因为汉语形、音、意三者合一的语言基因和“六经皆史”、以《诗》教育、以《诗》交流等其

他文化因素,一直呈现出诗、史不分的理论形态。以诗证史和以史证诗,一直是中国史学和诗学的传统。不过,自《宋书》之后,除了萧子显的《南齐书》还有“载文”的习惯以外,《梁》、《陈》二书已很难像《宋书》那样大量引证《诗经》和诗作以及民间歌谣,让我们触摸到中国诗学发展的脉络了。

注释:

- ①《梁书》卷十三《沈约传》载梁武帝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34页)《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九引《梁书·何逊传》曰:“何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时谓之‘何刘’。梁元帝著论云:‘诗多而能者沈约,文少而能者谢朓、何逊。’”〔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96页)钟嵘《诗品》中“梁左光禄沈约诗”条曰:“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故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经纶,而长于清怨。”〔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426页)
- ②《世说新语·言语》“谢混问羊孚”条注引《晋安帝纪》曰:“混字叔源,陈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学砥砺立名。累迁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坐党刘毅伏诛。”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 ③《诗·大雅·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毛传》曰:“温温,宽柔也。”郑玄《笺》曰:“宽柔之人温温然,则能为德之基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6页。
- ④《诗·大雅·桑柔》“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毛传》曰:“厉,恶。梗,病也。”郑玄《笺》曰:“谁始生此祸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58页。
- ⑤按:哥即“歌”字。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十六《梁书》“式哥且诵”条曰:“哥古歌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06页)
- ⑥按:刘裕及其子孙,文化素养可以说与一般武将不相上下,虽然文帝、孝武帝受过较好的培养,但其子侄都表现平庸:“太祖诸子,(刘)祗尤凡劣,诸兄弟蚩鄙之”、“(刘)休范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所齿遇”,“(刘)子尚既长,人才凡劣,凶慝有废帝风”。沈约《宋书》,第2038、2046、2059页。
- ⑦《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二》曰:“孙休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子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为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沈约《宋书》,第913页。
- ⑧《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二》曰:“孙皓初,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皓寻迁都武昌,民泝流供给,咸怨毒焉。”沈约《宋书》,第913页。
- ⑨《宋书》卷二十七《符瑞上》:“吴亡后,蒋山上常有紫云,数术者亦云,江东犹有帝王气。又谣言曰:‘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元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过江,而元帝升天位。”沈约《宋书》,第782页。
- ⑩《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二》曰:“晋惠帝永兴元年,诏废太子覃还为清河王,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犹加侍中,大都督,领丞相,备九锡,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礼,传国以胤不以勋,故虽公旦之圣,不易成王之嗣。所以远绝覬觐,永壹宗祧。后代遵胤,改之则乱。今拟非其实,僭差已甚。既且为国副,则不应复开封土,兼领庶职。此言之不从,进退乖爽。故帝既播越,颖亦不终,是其咎也。后犹不悟,又立怀帝为皇太弟。怀终流弑,不永厥祚,又其应也。语曰:‘变故易常,不乱则亡。’此之谓乎。”沈约《宋书》,第901页。
- ⑪《宋书》卷九十三《隐逸·陶渊明》载其《命子诗》曰:“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恒恒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沈约《宋书》,第2290页)我怀疑这首《命子诗》极有可能是沈约后来总其全书,在齐武帝时期最终编定时加上去的,宋代的史臣恐不敢录此诗。在当朝天子命撰的当代史书中称道前朝,徐爰等人恐不敢胆大如此。
- ⑫陶渊明《拟古诗》第二。刘履《选诗补注》曰:“凡靖节退休后所作之诗,类多悼国伤时托讽之词,然不欲显斥,故以拟古、杂诗等目名其题云。”(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18页)陈寅恪说,渊明这里说的“商”,指的是四皓入商山隐居一事;“戎”,指老子化胡入西戎,他的《桃花源诗并记》既是“寓意之文”,又是“纪实之文”。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页。
- ⑬徐爰注“雉鸢鸢而朝鹄”曰:“鸢鸢,雉生也。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雉,颜延年以潘为误用也。案:《诗》‘有鸢鸣雉’,则云求牡。及其朝雉,则云求雌。今云‘鸢鸢朝鹄’者,互文以举雄雌皆鸣也。”〔梁〕萧统撰、〔唐〕李善注《文选》,中

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39 页。

- ⑭按:今《诗·小雅·桑扈》作“交交桑扈,有莺其羽。”与徐爰注引不同。待考。〔梁〕萧统撰、〔唐〕李善注《文选》,第 139 页。
- ⑮《宋书》卷九十四《恩倖·徐爰传》曰:“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元嘉)六年,又以(徐)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沈约《宋书》,第 2308 页。
- ⑯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四“简文称许掾曰”条注引《续晋阳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 262 页。
- ⑰《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载长统诗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646 页)
- ⑱《经典释文序录》曰:“《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吴检斋《疏证》引《隋志》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0 页。
- ⑲在《新科学》中,维柯用很肯定的语气说:“赫库勒斯(Hercules,一译赫丘利。罗马神话里的英雄,即希腊神话里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引者注)把阿特拉斯肩上背得太累的天空取来放在自己的肩上一定是在〔希腊本土的〕毛里塔利亚,因为阿特拉斯这个名称原来一定就是阿陀斯峰(Mt. Athos),这座峰在一块峡地颈项上,后来由波斯帝泽尔士(Xerxes)割断,从此就把马其顿和色雷斯分开,那里还有一条河也叫作阿特拉斯。”〔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93 页。
- ⑳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成‘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8-29 页。

参考文献:

- [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7.
- [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4]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5]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6]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8]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 [9]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于北山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10]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11]萧绎.许逸民.金楼子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2]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唐 普]